



莱茵哲影

这个100年前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富裕而极具文化教养的犹太家庭的独生子，一生在痛苦和绝望中煎熬。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遭遇过太大的不幸。他虽也曾为逃避纳粹的凶焰亡命海外，但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可他从未觉得幸福和满足；相反，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被毁了的人生”。“无数悲泣消融了盔甲，唯有脸上印着泪水的痕迹”，曾被他用过的贝克的这两句话，既是他人生的写照，也是他形象的写照。他悲剧的思想和命运甚至也反映在他的形象上。从他留存下来的照片看，从童年到晚年，他的面容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忧郁加警惕。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汝伦 著

莱茵哲影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莱茵哲影 / 张汝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ISBN 7-208-05517-3

I. 莱... II. 张... III. ①哲学—德国—文集

IV. B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2592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姚映然

版式设计 小二猫



莱茵哲影

张汝伦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5,000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517-3/B·462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自序	1
何谓学者	4
康德二百年祭	11
黑格尔和现代国家	25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37
回到事物本身	46
海德格尔公案	53
哲学与实践	64
哲人与爱	71
伽达默尔和哲学	84
永远的阿伦特	99
在哲学和艺术之间希望和绝望	113
为了生命的现在与未来	136
对未来负责	165
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	172

自序

德国哲学名闻天下，但德国哲学之艰深也使许多人望而生畏。若问对德国哲学的印象，恐怕在许多专业人员看来，德国哲学主要也是以不食人间烟火，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学为其特色。德国哲学家的著作在许多人看来几近天书。读不懂的结果一定是两个极端：盲目崇拜和不屑一顾。其实，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胡塞尔、海德格尔，每个人的著作都是对智慧与耐心的考验。徒有热爱没有智慧人不了哲学之门。但哲学爱好者一般是不会怀疑自己的智慧的，德国哲学晦涩枯燥的表述方式，反而更加坚定了上述人们对德国哲学的成见。

中国人历来相信文如其人；法儒毕丰亦云：“风格即人。”德国哲学的特有表述使人们自然而然相信，写出这些天书般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其生命也一定如其著作般枯燥无味。他们不管人间冷暖，只顾闭门构造自己的体系。康德或胡塞尔就是现成的例子。

然而，这些对德国哲学和德国哲学家的看法，几乎都是错的。德国哲学晦涩难懂并不一定不管人间冷暖；分析哲学家的表述倒是清楚明白，可我们在他们的著作里看不到半点时代风暴，世事沧桑。哲学的表述形式与哲学的现实关怀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哲学成就的高低，却与其人间性和实践性大有关系。吸引不同世代人类的，从来就不是超越世界的妄想，而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关切。德国哲学之所以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不是由于它的晦涩，也不是由于它的形而

上学，而是由于它的人间关怀。

早在德国哲学的童年，马丁·路德就向被希腊哲学概念化的经院哲学发起了猛烈攻击。在路德看来，由于这种抽象的概念化，经院哲学使（原始基督教）具体的历史经验失去了生命。“上帝只能在痛苦和十字架上找到”（路德语），即只能在真实的生命经验中找到。而德国古典哲学在卢梭的启发下，自信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把生命从概念的人为世界的迷雾和幻觉中解放出来，使思维与自发地自我发展的人的生命相一致。^{〔1〕}德国哲学的价值也在于此。那些不明此理，有意无意将德国哲学视为一种“高空行走”之玄学的人，无论赞美还是反对，都不足以语德国哲学。

以回到生命经验本身，或回到事情本身（这是黑格尔最先提出的口号）为追求目标的德国哲学家，就其个人一生遭际来说，的确有不少平淡无奇。但这种平淡无奇不能理解为他们人格的贫乏无趣，而是因为他们以学术为生命，以哲学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孜孜矻矻，几十年如一日，埋头工作，心无旁骛，这才能创造出许多不朽的巨著。德国哲学家的高产与他们著作的质量同样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然而，埋头学问不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谨小慎微的德国哲学家，心中笔下却总是人间冷暖，世事沧桑。他们以自己的思想与历史与时代互动，因而也就活在历史和时代中。当然，也有些人不满足于坐而言，也想起而行，如海德格尔，结果和西西里的柏拉图一样狼狈。但却

〔1〕Cf. Dieter Henrich, *Aesthetic Judgment and the Moral Image of the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85.

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哲学家是否应该介入公共生活？如果是的话，在公共生活中哲学家如何行动？哲学家的思想和行动（实践哲学意义上的）是不相干的两截，还是不可分开？不仅海德格尔；康德、黑格尔，甚至胡塞尔，都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中国人自古就有知人论世的说法，这实际上是要求在人与时代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同时考察二者。然而，根据现代学术工业的不成文的“潜规则”，一般的学术文章不会从哲学家一生行谊出发来考察和理解哲学家，“学术文章”给我们提供的充其量是“没有人”的思想。即使哲学家，他们的思想难道仅仅受抽象理性和逻辑的支配？如果除了理性与逻辑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这些别的东西有时甚至比理性与逻辑更有影响力，为什么它们入不了“学术文章”的法眼？流行的学术文章的“规范”和“格式”真的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吗？

本书所收文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按所谓“学术论文”的模式来写，因为作者希望它们的读者不仅仅是“专业人士”；虽然它们涉及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所谓的“学术论文”缺乏思想性和哲学深度。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哲学家的生命经历（Erlebnis）看作是他们哲学的一部分，希望能从他们与时代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观察他们的思想。在此意义上，这些文章可以算是“知人论世”的文章。它们的根本目的，则是要表明真正的思想者必然是行动者；真正的哲学，一定是实践哲学。因为哲学本身就是生命自身的实践。

是为序。

何谓学者

现代人是慷慨的，他们毫不吝惜地使用一切庄重而有着严肃内涵的头衔和称号。既然炒股大户都可以受聘于高校，武侠小说大师荣登中文系讲坛自是当之无愧。至于畅销书作者被称为学者，当然更无不可。

不过按常识想来，“学者”就是“学者”，“学者”既不能等同于“事业成功人士”，也不能等同于“闻人”或“名人”，甚至连“文人”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学者之为学者，应有他特殊的使命、品格和德操，当然也必须有货真价实的学问，否则没准真会有一天，“学者”和时下的“总经理”一样，多如过江之鲫了。

然而，何谓“学者”？在一般人看来，这几乎是一个考白痴的问题：学者就是搞学问并且有学问者。但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问题的答案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1794年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耶拿大学作了题为“学者的道德”的系列演讲。其中第四讲题为“论学者的使命”，便讨论了上述问题。费希特首先分析了构成所谓学问的三种知识，然后给学者下了如下的定义：“谁献身于获得这些知识，谁就叫做学者。”学者的真正使命是：“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因为学者的进步决定着人类发展的一切其他领域的进步，“他应该永远走在其他领域的前头”。所以“他应当尽力而为，发展他的学科；他不应当休息，在他未能使自己的学科有所进展以前，他不应当认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职责”。并且，真正的学者“要忘记他刚刚做了什么，要经常想到他还应当做什么”。但这些都还只属

于学者的私德，是否是学者更要看学者的公德，学者的气节。因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着这样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因为他掌握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会”。这就是说，“学者现在应当把自己为社会而获得的知识，真正用于造福社会”。但这并不是狭义的庸俗的学以致用，而首先是指学者要向社会指明真理。正是在此意义上，费希特把学者叫做“人类的教师”。当然，学者并不单纯指明一般的真理，“他尤其应当随时随地向他们指明在当前这个特定条件下出现的需求以及达到面临的目标的特定手段。他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如果人类想坚持自己的最终目标而不偏离或后退的话。”

但这还不是学者的最高使命。因为在学者的职责之上还有人的职责，人的职责应当高于学者的职责。这个职责就是提高整个人类的道德风尚。这是每一个人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社会的最终目标，而且也是学者在社会中全部工作的最终目标。学者的职责就是永远树立这个最终目标，当他在社会上做一切事情时都首先想到这个目标。但是，谁不是善良的人，谁就无法顺利地致力于提高人类道德风尚的工作。……所以，学者从这最后方面看，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对读书人的基本要求。言教身教并用，身教重于言教，给社会树立道德榜样，既是历代儒家大师的教导的核心，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从孔孟到程朱陆王，无不如此。这些往圣先贤个别人品上也许不无小疵，从大面上看基本上留下了一个真正人——符合他们自己所教诲的学者

的形象。他们都既有继往开来的宏大历史使命感，又有脚踏实地、躬行践履的实践精神；他们不仅给他们的时代，而且也给人类留下了足当万世楷模的道德榜样。费希特下面这段话说出了古今中外历代真正学者的心声：

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这些民族将来还会变化。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

然而，人类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们不需要这样的学者，因为面对这样的人——学者，他们倍觉难堪。于是想尽一切方法将其谋杀！创造和发现成批量的学者，同时对崇高发出卑劣的嘲笑。尽管他演讲的听众使“耶拿最大的大学教室都太狭小了，整个前厅和院子拥挤不堪。桌子和长凳上都站满了人，一个挤着一个”，但费希特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妄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鄙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于衷。”为此，他要求立志献身学术的青年要有一种大丈夫的思想方式，一种对崇高和尊严的强烈感受，一种不怕任何艰险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的火一般热忱。他们要“至死忠于真理；即使全世界都抛弃她，他们也一定采纳她；如果有人诽谤她，

污蔑她，他们也是会公开保护她；为了她，他们将愉快地忍受大人物狡猾地隐藏起来的仇恨，愚蠢人发出的无谓微笑和短见人耸肩表示怜悯的举动”。

可是，现代人的确是比以前更聪明，对人性的想像和理解也比从前更复杂一些了。他们纵然不说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陈义过高，也会打出理解和宽容的正大旗号，将人性归结为一切弱点和阴暗面的总和，从而证明人不可能那样去做；或者将自己一切怯懦、卑鄙、庸俗、丑行乃至罪恶归结为迫于外部环境和压力，而将自己的道德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更卑鄙的是采取洪洞县里无好人的策略，处心积虑将一切往圣先贤拉到他们的平面上，证明鹰和鸡原是一回事；并且，既然鹰就是鸡，那么鸡当然也就成了鹰。尽管在鹰面前无论如何总感到心理压抑，因而老想贬鹰为鸡；但鸡还是忍不住要当鹰，不管扇动孱弱的翅膀扑腾会显得多么丑陋与可笑。然而，不管怎样，人们无法否认有过孔孟程朱，有过苏格拉底和布鲁诺这样的真正的学者。“何谓学者”其实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现代学者中常常见到学术与人格的分裂，学者的职责与人的职责断为两概的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

素以学术博大精深、严谨厚实著称于世的德国学术界，为人类贡献了众多无与伦比的天才大师，可在纳粹统治时期，大批一流学者先后落水，充当纳粹的帮闲甚至帮凶，海德格尔和海森堡是两个特别令人注目的例子。从学术角度讲，他们都堪称学者的学者，可是从费希特对学者的要求来说，就大成问题了。德国学术界在纳粹时期的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普遍现象，迫使每个人，首先是学者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何谓学者？1947年，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在就任莱比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特意结合德国学者对待纳粹的软弱妥协的

态度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学者首先必须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缺心眼，这种方式只对那些面对真理的终极问题的人才会发生。一个这样的例子发生在希腊哲学之父——米利都的泰勒斯身上。据说他因只顾仰望星空却掉入井中，虽被女仆救上却赢来她的一阵窃笑。千百年后黑格尔提起此事还愤愤不平地说：“奴仆眼里无英雄。”即使在今天，我们仍不少那些缺心眼的教授学者的此类趣闻轶事，人们也的确常常对此津津乐道，但伽达默尔提醒人们注意，这种不在意和缺心眼只是硬币之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专注和沉浸于所研究的问题中。这些轶事可能真是缺点，我们并不希望去赞美它们。如果它们似乎要导致真正忽视了这个世界，它们肯定应受责备。但每一职业就像每一个人一样都要承受它们美德的重负。学者的美德就是无条件地埋头问题，从而忘掉一切对于他人，甚至自己，上帝和世界的考虑。伽达默尔然后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这种客观性力量在所有德国学者中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决不会受惑去对纳粹政权逆来顺受。

其次，学者在他工作过程中一直生活在自我怀疑中，这甚至可达到绝望的地步。人们对自己的环境评判很准，却很难公平对待真理和认识的内在要求。学者必须说的是在将来才会得到普遍承认的真理，这是学者的悲剧。虽然学者是他的时代和世界的孩子，他也总是以一种新的、沉重的孤独超越它们。但他从这孤独中带回的是他特性的最伟大力量：他自己的判断和对已被认识的东西不合格的鉴定。伽达默尔沉痛地说：如果这种鉴定的力量在所有德国学者中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决不会受惑去对纳粹政权逆来顺受。

第三，学者必须有真正的谦恭，他在工作中经历的苦恼非常有说服力地使他明白他能力的界限和他任务的压倒的规

模。宽宏大量地承认别人的判断和去除自己身上自己立场的种种傲慢仍属他的本分。尊重一切诚实地做过的工作，无论它可能是何种类型，自然也一定属他的本分。这样他就有内在的自由可以免于他的社会出身的种种偏见，而成为社会上一切进步力量的天然同事。伽达默尔感慨万千地说：如果这种谦恭的力量在所有德国学者中足够强大的话，他们就决不会受惑去对纳粹政权逆来顺受。

比起费希特来，伽达默尔的语调是沉静的。但这是一种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后一个真正的学者反思的沉静。他讲的学者应有的三种品格，实在不能说是陈义过高，而应该是所有的学者，只要愿意，都可以做到。这里丝毫没有要求学者应该成仁取义，不避斧钺那种强人所难，所要求的只是学者的本分，是学者的品德的最低要求而非最高要求。然而，即使这些最低要求，现代学者也很难满足了。现代学者们在名利地位、利害关系、荣辱得失上花去的心力，远比在学术活动上为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越到现代，大师越少的缘故了。然而，由此受损的不只是学术。既然名利地位远比学术重要，那么自然，只要需要，曲学阿世，出卖人格都在所不惜了。这样必然导致人类的尊严受到践踏，社会正义荡然无存，而这既是纳粹政权的恶果，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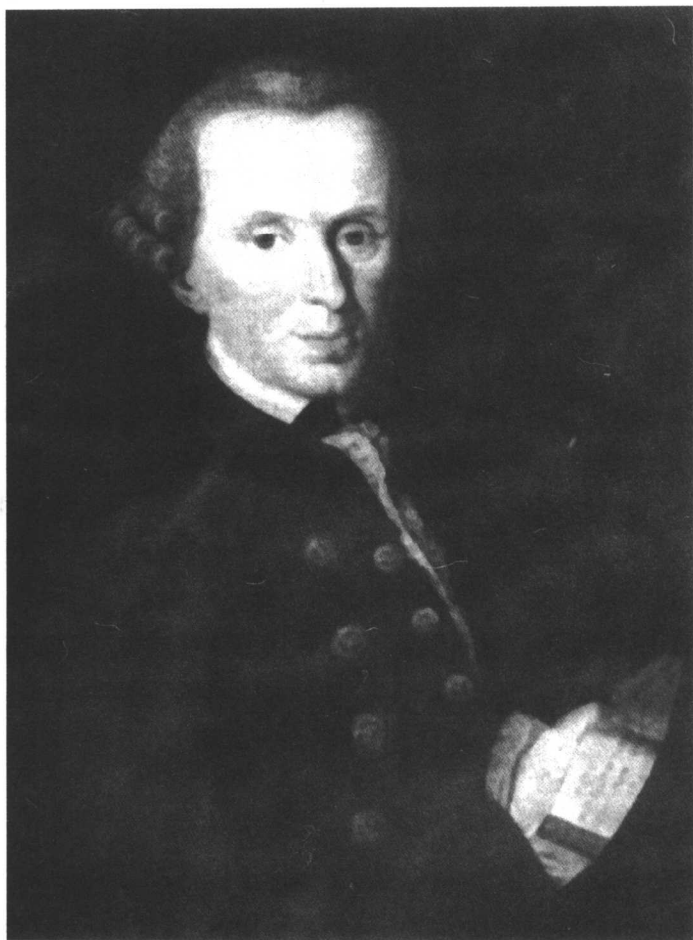
令人惊讶乃至费解的是，曾经产生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这样旷世绝伦的大思想家的德国学术界，居然会在纳粹统治时期一度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鉴定力，连海德格尔也在他的《形而上学导论》中谈什么“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内在的伟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但耐不住寂寞恐怕的确是原因之一。然而，从中世纪一直到近代，德国思想界一直有一些人，抱着虔诚坚定的“为上帝工作”的信念，哪怕遍地战乱，哪怕世人的嘲笑，哪怕写出的著作只有老鼠

牙齿的批判，他们依然如故，义无反顾地从事追求和探索真理的工作。马克思和尼采是两个近代的典型，他们深信自己工作的历史价值，当世名声对他们来说如过眼烟云。阅读他们的著作不但能感受到超凡的思想力量，同时也能感受到超凡的信心力量。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现代的德国思想界的确应该感到羞愧。利令智昏，在现世利益优先考虑之下，丧失自己的判断力和鉴别力是必然的。如果我们同意费希特所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的话，那么严格地讲，德国学者对纳粹肆虐12年负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无论从他们对纳粹政权可耻的卑躬屈膝还是从他们愚蠢的自以为是来说都是如此。

德国学者向来有精神贵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如果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中有益无害，但若发展为一种舍我其谁的愚蠢的傲慢，就不但显得可笑，而且也会使他们失去正常的判断力。海德格尔在纳粹上台之初要“领导元首”的想法其实就是出于这种愚蠢的傲慢，这种愚蠢的傲慢也使他们不可能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及时遏制纳粹上台的势头或结束纳粹的罪恶统治。

德国学者在纳粹时期的惨痛经历告诉我们：何谓学者？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要求每个学者用自己的一生去回答。对于现代学者来说，这是一个越来越难的问题，一旦放弃这个问题，学术与学者都将归于消灭。

康德二百年祭



康德，1768 年

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逝世 200 周年，应该是今年人类精神日历上最醒目的标记。与在雅典举行的奥运会一样，纪念康德是今年全人类共同的文化活动。如果说前者基本上已经成了商业资本运作的行动，那么后者也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学术工业的一个例行公事。其实，这个已经长眠 200 年的哲

人根本无需今人为他招魂，他从来就没有死去。与他的后来者黑格尔、尼采或海德格尔不同，康德一直得到各种哲学背景的人的尊敬。他的认识论始终是各国哲学系必有的课程：“人是目的”的命题更是脍炙人口；康德判断力学说也为识者津津乐道；而他先验构造的方法至今还为许多人模仿。然而，这是在所谓的学术界。在学术界之外，康德是否仍然活着？他是否仍然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中？他的问题，是否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用经验的证伪法来判断一个理论或思想的生死真假，伟大或平庸，那么康德哲学似乎很不妙。康德坚信理性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他的哲学因而被人称为“理性的神正论”。然而，对于经过历史主义和人类学洗礼的生活在后现代文化中的人们来说，理性总是植根于特殊的时间和地点中，它的产物总是反映了它的根源背景。理性的普遍性不是迷思（myth），就是迷梦。即使把深层的文化差异问题放在一边，后康德的人类思想与经验早已充分证明人往往、甚至主要不是被理性所支配，而是他们利益、偏见、信仰和欲望的奴隶。康德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的人类经验和遭遇似乎证明，康德的思想最多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一个不断被残酷的历史轻易证伪的良好愿望。

然而，康德并不天真。与他的启蒙同时代人不同，康德对于人的丑恶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他同样看到，人与动物之不同的确在于他有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始终服从理性。相反，在理性与欲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理性及其完善只是对人类这个物种而言；个人基本上为自己的自然欲望所驱使，所以他往往不能满足和符合道德律令的要求，“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恶和毁灭欲所交织成的”，这使得人类历史至今还是一个罪恶的故事。

康德尽管因此无法抑止对人类的某种厌恶之情,但却没有因此动摇他对理性的信仰。他还有一个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法宝——目的论,尽管这个法宝早已被他的启蒙同时代人作为“迷信”扔到了一边。他相信目的论将保证理性在历史中的最终胜利。



康德的剪影

康德的论证是,虽然实践理性在实践中可能是无力的,但我们可以自然本身的运作中找到它的替代:“现在大自然就来支持这种受人敬爱的但在实践上又是软弱无力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公意了,而且还恰好是通过这种自私的倾向。于是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怎样组织良好的问题……可以使他们自私的力量彼此相对,以至于每一种都足以防止其他各种的毁灭性作用或抵消它们。对于理性来说,结果就好像是人的自私倾向不存在,而人即使不是一个道德良好的人,也被迫成为一个好公民。”(《永久和平论》)即使人的自私倾向也会导致理性的目标。例如,虽然民族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和战争,但武器的日益发达和战争代价的巨大会迫使各个国家放弃战争。此外,从商业利益考虑战争也是不明智的。总之,康德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认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使得人类众恶的博弈最终的